



新疆社会科学院专家学者文库

新疆近世史论文选粹

纪大椿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社会科学院专家学者文库

新疆近世史论文选粹

纪大椿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新疆近世史论文选粹 / 纪大椿著. —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11.7

(新疆社会科学院专家学者文库)

ISBN 978-7-228-14353-5

I. ①新… II. ①纪… III. ①新疆-地方史-近代-文集 IV. ①K294.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32503 号

责任编辑 贺 灵

整体设计 王 洋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	830001
发 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电 话	(0991)3652361
印 刷	新疆八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mm 1/16
印 张	29.75
字 数	487 千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 000 册
定 价	53.00 元

《新疆社会科学院专家学者文库》编委会

一、编辑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主任委员：吴福环

副主任委员：阿不都热扎克·铁木尔

委员：苗普生 张运德 阿布都热扎克·沙依木 库兰·尼合买提
刘仲康 潘志平 董兆武 田卫疆 齐清顺 王 宁 马品彦
郭泰山 刘国防 阿不都热依木·哈力克 阿班·毛力提汗
米娜娃·阿不都热依木 白 莉 艾比布拉·阿不都沙拉木
李晓霞 木拉提·黑那亚提 李树辉 宋建华 柴 林

主 编：吴福环

二、办公室组成人员名单

主 任：李行力

成 员：王 磊 古丽巴哈尔

序

哲学社会科学承担着“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职责。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是人类文明和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疆地处祖国西北边陲,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历史悠久、资源丰富,战略地位重要,发展前景美好。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社会快速变迁的今天,新疆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撑,也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新疆社会科学院正式挂牌成立于1981年,30年来,新疆社会科学院的科研人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新疆改革开放及社会稳定大局,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社会田野调查和系统精专的学术研究。早在20世纪50年代,新疆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就开始进行农牧区调查和有关新疆历史问题、民族宗教问题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新疆社会科学院的科研人员,足迹踏遍天山南北、绿洲草原,身影留在农家小院、牧民毡房、工厂车间、学校课堂、兵团连队、军营哨所,查阅和整理浩如烟海的古籍文献、图书档案,撰写调研报告,发表学术论著,领域涵盖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新疆历史、社会、政治、法律、经济、民生、民族、宗教、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文学艺术、文化以及新疆周邻的中亚等国际问题。几十年来,这些研究成果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府决策起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是一项艰苦的脑力劳动,几十年“冷板凳”,几十年“爬格子”;身居陋室,

心怀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如春蚕吐丝,似蜡烛燃烧。这些正是中国千千万万爱国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

几十年来,新疆社会科学院几代专家学者出版了数百上千部著作、数万篇论文和研究报告,其中蕴含着他们的心血和赤诚。他们是新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以及改革开放事业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见证人。2008年,新疆社会科学院决定支持和资助院里具有正高职称(研究员、教授)的专家学者每人出版一部文集,先从离退休专家学者做起,逐步扩展至在职者,每人从自己毕生发表的大量论文中精选数十篇代表作,结集成书,经新疆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审核通过后付梓出版。每一部文集都是作者辛勤耕耘的结晶和智慧的阐发。阅读这一部部文集,我们可以看到每位作者的学术历程和进步,也可以从中看到新疆几十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历程。这套文库的出版,是多年来新疆社会科学院专家学者科研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现,是奉献给社会的一批精神财富。同时,这些成果对于年轻研究人员来说,也是一套极有价值的学习资料。

我衷心祝贺这套文库的顺利出版,并祝愿新疆社会科学院不断推出更多更新更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从而为推进新疆的跨越式发展、社会长治久安以及各民族文化和谐作出应有的贡献。

吴福环(新疆社会科学院院长、教授、博士)

2010年10月10日

自序

1935年我出生在浙江杭州。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全家随祖父的工作单位逃难到上海,后来在一间租屋的附近上学。私立学校收费很贵,父母督促我将来一定要考公立学校。1950年我走进了同济大学附属高中的校门,不久它改称上海市同济中学。

同济中学地处远离市区的江湾五角场。师生们的生活都很简朴,尽管有自来水可用,大家都乐于汲用井水。周末回家,住在虹口一带的同学为节省5分钱的车钱,结伴步行1小时,戏称“马拉松”;我也时常同大家走一段路再乘坐公交车。由于智商不高,学习数理化颇觉吃力,报考高校时,便从学医的梦想转向了文科。2个班70多人在不分文理科的统考之后全都进入高校,读文科的仅5人。我被录取在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

1953年高校院系调整基本完成,全面学习苏联,课堂教学排得满满的。课后我喜欢在图书馆复习功课,那里的学习氛围对我是一种约束,丰富的报刊和工具书可以长知识、解疑难。宿舍—教室—图书馆,是“三点一线”式单调的大学生活。大家感兴趣的是到老师家里去贺岁拜年,有机会就请教怎样编讲义、怎样写文章。老师们很乐意拿出笔记和卡片让我们看,还说:没有新资料,没有新观点,不要轻易写文章;写文章就该有所发现、有所创见,不要人云亦云;写完之后不要急于发表,放些日子再看看,一定会发现不少先前意料不到的问题,可以及时补充修改,免得事后追悔。师长们无私传授的治学经验,后来都用上了。

修学期满正赶上1957年的夏季,毕业班提前停课“反右”。怕耽误毕业论文的撰写,继而影响毕业成绩和工作分配,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抵触,我也说过一些过头话。首当其冲的是平日就有些“问题”的同学,“次当其冲”的我们也遭受了许多不实的批判,我被指为“离‘右派’只有一步之遥”。政治辅导员张老师在安排做记录、整理记录时,同往常一样没有将我遗忘。这个业余“文书”伴随了我一段较长时间,它锻炼了我在纷繁复杂的事物面

前进行缜密思考和分析归纳的能力。

9月,毕业生开始分配。被分配到中科院新疆分院筹委会的有5人,没有一个“右派”,却多半被接受过“重点帮助”,包括我在内。本来打算找领导谈谈家庭困难,希望能做些调整,一想到那句“一步之遥”也就不敢多嘴了。带着满脑袋的无可奈何和忧虑茫然,夹杂着对有幸从事科研的点点憧憬,踏上了西行之旅。11天的火车硬座和长途卡车,将我们从渤海之滨送到了天山脚下。

大概是11月,新疆科学分院筹委会副主任谷苞,在新落成尚未点火开灶的食堂里召集10多人开会,宣布历史研究室成立;下分若干组,我被分在民族组。不管什么组,当时所有的专业人员都参加了全国人大民委组织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我的研究生涯就是从这里起步的。

第二年8月,我们一组3人前往察布查尔,进行了两年的田野调查。虽然“大跃进”给调查工作造成不少“后遗症”,但对我来说,毕竟增长了见闻和才干,也发觉了自己的不足。既然民族组的主要任务是从事社会调查,就必须学会维吾尔语。领导同意我们找个短期训练班去学一学。还没有找到这样的短训班,牧区调查开始了。任何进修和培训从此同我以及我们一批人完全绝缘。随后贯彻“八字方针”,刚刚升格的民族所也必须“精简”:牧区调查半途而废,民族组撤销,我被调到资料组。因经费紧缺,外出购书中止。我趁机读了一些史料,做了卡片和笔记,还自学了逻辑学方面的著作,获益良多。

“冷板凳”坐了一年多,又被别的单位借调去工作了一年,回到所里正是1964年年底。新来的陈慧生副所长将我调到历史组,接手李炳东因工作调动而中断的《新疆简史》下册的编写任务。经过一年半的努力,完成了修改和增补。还没来得及征求意见,“文革”动乱降临,正常工作被迫中止。

在此期间,民族所从新疆科学分院析出,单独建制为自治区民族所,日常行政由自治区科委代管。“文革”后期奉上级“革委会”的安排参加了一些业务工作,真正恢复史学研究是在“文革”结束之后,尤其是新疆社科院成立之后。不久,院内机构略有调整,几个史学研究室从民族所析分出来另建历史所。科研工作逐渐步入正轨,可是经费问题一度又困扰着人们。

1978年,新疆人民出版社为编辑《新疆历史论文集》派人来组稿,我写了《龚自珍和他的〈西域置行省议〉》一文。因为是第一次公开发表文章,感到没有把握,特意请郭平梁看了看,问他这样撰写合适与否。承蒙老郭的肯

定,我才放心地把稿子交出去。自此以后,各种书稿和文章就从我的笔下流淌出来。主要是服从领导的安排,在集体项目中承担清代晚期的研究任务;因为人手不足,涉及整个清代史和民国史的一些项目也安排我参加。幸亏在资料组时阅读过清代史料,被借调在外时又钻研过民国史,有了这样的基础,承担的任务都能较为顺利地完成任务,研究范围也相应有所扩展和延伸。

我们从事的边疆史、民族史研究,是高校通史教学中极少涉及的,当年可资借鉴的成果也不多。旧时的种种错误观点和似是而非的结论,以及许多实际的疑难问题,都需要我们运用学到的基本的科学历史观和治学方法,去认真地耙梳史料,去分析鉴别,去探索求解,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一旦从复杂纷乱甚至自相矛盾的史料记载中获得了新知,获得了对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的认识,对历史的认知便上升到理性层面,对于指导今后的工作大有裨益。

往事历历,难以忘怀。我十分感谢院、所领导对资料建设的重视,从无到有逐步积累起了一些基本资料,具备了从事一般研究的条件。我还感谢各级领导,在我还没有显露出才干的时候,给我以信任,允许我在科研道路上摸索前进,积累学识、增长才干。同时,我也非常感谢合作共事的同仁,没有众人的切磋研讨,难以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没有一定的学术氛围,难以形成竞争向上的风气,取得共同的进步。

我经常怀念十多年来老师们给予的谆谆教导。小学里第一位英语老师杨友仁给了我一个英文名“Raymond”,我音译成“芮梦得”作为笔名,用以感谢老师们给我的基础教育。重访同济时,我带去了一些小册子送给母校的图书馆,以供师弟师妹们课外阅读。对于南开的师友,我寄去过一些作品以求赐正,其中有《新疆近世史论稿》,那是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马大正在1998年嘱咐我编选并予以出版的一本自选集,辑入的都是退休前的作品。来新夏老师来信赞扬说:“栖身西陲,艰辛可知;勤于著述,无愧此生。”魏宏运老师在《历史教学》2004年第7期上发表《简评〈新疆近世史论稿〉》一文,赞扬我“献身于新疆的历史研究事业,做出了出色的成绩”。老师的赞扬令我汗颜,老师们诲人不倦、笔耕不辍的言传身教也给我以鞭策,促使我退休后再继续作文,决不辜负老师和史学界同仁的期望。

历史赋予我们一代人的任务是创建一个初具规模的研究机构,拿出一些基本研究成果,经过大家的努力算是做到了。近些年来,全院科研经费已经较前宽裕,物质条件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加上时代的进步、计算机的普

及、互联网的兴起以及数字图书馆的创建,为深化和拓宽研究领域提供了新的手段。评价我们一代人所取得的成绩,探索我们一代人未尝涉足的课题,是后来者的光荣使命,热切地期待后来者在新的时代取得新的成果。

纪大椿,序于梦得斋

2010年12月,时年七旬有五

目 录

序	(1)
自序	(1)
龚自珍和他的《西域置行省议》	(1)
论清同治三年新疆农民起义	(11)
阿古柏对新疆的入侵及其覆灭	(24)
关于阿古柏之死	(39)
中俄伊犁交涉的真相	(43)
沙俄驻新疆各领事馆的建立年代	(51)
论清季新疆建省	(57)
新疆建省余事述议	(72)
论新疆以建省为核心的改革	(77)
团结战斗迎共和——纪念辛亥革命运动中的迪化起义和伊犁起义	(107)
苏联与新疆三区革命	(112)
新疆三区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纪念三区革命爆发五十周年	(130)
抗战胜利前后的时局与新疆地区和平的实现	(146)
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对新疆的渗透与破产 ——兼评分裂主义旗号：“东突厥斯坦”	(157)
一场和平的战斗——纪念新疆和平起义 40 周年	(171)
对新疆和平解放的再认识	(183)
包尔汉：新疆首任人民政府主席	(190)
反对分裂主义斗争的再认识——乌鲁木齐“7·5”事件引发的思考	(207)
林则徐回疆勘田述议	(219)

清末南疆的蚕桑业	(230)
新疆的驿路、公路和铁路——新疆境内丝绸之路的历史变迁	(236)
清末修建新疆铁路之议	(245)
潘效苏与新疆河西间的“站车”——二十世纪初新疆交通史一瞥	(250)
近世新疆通用的计量制度和工具	(253)
近世新疆人口问题的历史考察	(265)
哈巴河县原加尔克巴斯阿吾勒调查	(277)
布尔津县牧区长征公社调查	(291)
中亚的中国移民	(305)
中西回俄历法的比较研究	(314)
“回回国王阿卜都里什特”世系考	(323)
吐鲁番郡王额敏和卓	(331)
纪晓岚和他笔下的新疆	(335)
乾隆时期寓京维吾尔人和敕建清真寺	(340)
喀什“香妃墓”辨误	(351)
论松筠	(363)
反侵略斗争中的两位小人物	(377)
棍噶扎勒参同沙俄斗争记事	(380)
新疆历史上的地名及其变迁	(384)
不要将 Turkestan 译作“土耳其斯坦”	(389)
六城·七城·八城——塔里木盆地周缘各城总称考略	(391)
阿雅尔淖尔考	(397)
“安南工”地名的来历	(401)
清代伊犁皇渠的开凿年代	(406)
新疆察布查尔调查散记	(409)
哈萨克牧区调查散记	(420)
我当了包尔汉的“编外秘书”——《新疆五十年》整理杂忆	(433)
《新疆简史》确立了我的研究方向	(445)
研究成果目录	(458)
后记	(468)

龚自珍和他的《西域置行省议》

中国的封建社会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至十九世纪以后,危机四伏,已经进入了它的衰亡阶段。当时土地兼并激烈,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农民起义不断爆发。规模较大的有清嘉庆元年(1796)的川、楚、陕白莲教起义,坚持斗争九年,起义烽火遍及五省。嘉庆十八年(1813)又有冀、豫、鲁天理教起义,在北京附近的一支起义队伍还曾经杀进清朝皇宫,给清王朝的统治造成很大的威胁。在外部,有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鸦片走私和商品侵略。北方强邻沙皇俄国,对中国虎视眈眈,早就伸出了侵略魔爪。《中俄尼布楚条约》和《中俄布连斯奇条约》的签订,虽然暂时遏制了沙俄对我国东北及北部边境的侵略扩张,但是它对我国西北边境的侵略却一步紧似一步。一批批的哥萨克武装移民越过边界,侵入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我国蒙古族、哈萨克族人民的游牧地区。中亚的浩罕也时而亲自出兵,时而策动叛乱头子布拉呢敦的后裔入寇南疆。中华民族同外国侵略势力的矛盾日益激化,中国的封建社会内部一场较大的变革即将来临。

激烈的社会动荡,使一批新派官僚逐渐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分化出来。在国力渐衰、强敌入侵的严重关头,他们主张革新政治,发展生产,使国家重新富强起来。他们忧虑国家与民族的前途,同顽固守旧的官僚们展开了斗争。代表人物有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人,龚自珍是其中重要的一员。

龚自珍,字璚人,号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生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他的外祖父是著名的学者段玉裁,父亲当过江南苏松太兵备道。他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官僚家庭里,幼年受过严格的封建学术教养,道光九年(1829)中了进士。先后做过内阁中书、宗人府主事、礼部主事等小京官,晚年辞官后在浙江丹阳书院教书。他在官场中失意一生,在学术上却颇有盛名,凡是史地、金石、诗词、文学、经学、子学、佛学等都有论述。他的政论文章在当时及后世都有相当的影响。魏源在《定庵文录序》中说:龚自珍“于经通公羊春秋,于史长西北輿地”;又说他的文章“以朝章国故,世情民隐为

质干”。^① 这就是说,龚自珍的治学,不是为学术而学术,也不是乾隆、嘉庆之世流行的脱离实际的烦琐考据,而是比较注意联系实际的社会政治问题,期望对社会上存在的问题有所解决。这在当时的学术界来说,确是别树一帜,开一代之文风。他的朋友张维屏后来说过:“近数十年来,士大夫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其风气实定公开之。”这也可作为龚自珍自己在诗文中所云“但开风气不为师”的注解。

对于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顽固派官僚们终日沉缅于醉生梦死的生活,以“康乾盛世”自欺欺人,对乾隆末年以来出现的政治腐败、军备废弛、财政拮据等现象,视而不见、充耳不闻。龚自珍却以他所处的时代所能达到的高度,对社会状况作了认真的研究,指出此时的中国,已经不是“治世”而是“衰世”了。^② 怎样才能从这“衰世”中挽救中国,使中国重新富强起来?这正是龚自珍关心政治、研究学问、钻研史地所希望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他认为,要使中国由积弱变强盛,除了“更法”图新以外,别无其他办法。他说“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③ 并且从历史上论证了每一代新兴者都是“革前代之败”^④ 才能有所作为。用发展变化的眼光来看待社会问题,使得龚自珍在分析当时复杂的社会现象时,得出了远比守旧派官僚正确的结论。

研究社会问题,不能不注意边疆问题。因为在当时,强邻环伺,西北边疆的现状堪忧。龚自珍用了很大的精力研究了内外蒙古各部落的历史与现状,研究了西藏,也研究了新疆。著名的《西域置行省议》就写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九年之后,他又写了《御试安边绥远疏》。这两篇文章主旨相同,可以将它们当做姐妹篇来读。在这一《议》—《疏》里,龚自珍提出了有利于国家统一,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保卫边防,有利于社会进步等一系列正确主张。

维护国家的统一与领土完整,是龚自珍研究新疆问题的出发点。

十八世纪中叶,清朝政府平定了沙皇俄国策动和支持的准噶尔封建贵族噶尔丹、阿睦尔撒纳等的分裂叛乱,平定了南疆伊斯兰宗教贵族农奴主大

① 《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650 ~ 651 页。

② 《乙丙之际著议第九》,《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6 页。

③ 《上大学士书》,《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319 页。

④ 《乙丙之际著议第七》,《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6 页。

小和卓布拉呢敦、霍集占的叛乱,从而结束了长期以来新疆的分裂割据局面,实现了全国范围内的大一统,打击了沙俄侵略我国西北地区的嚣张气焰。清朝平定叛乱、统一新疆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乾隆末年以来,国力逐渐衰落,财政经费拮据,这就使清朝政府内部派系之间的矛盾斗争尖锐化了。有些官僚大肆攻击当年平叛斗争是“翦人之国,灭人之嗣”,每年给新疆拨解二三百万两银子的“协饷”是“耗中事边”,得不偿失。随后又连续发生布拉呢敦的孙子张格尔的伊斯兰宗教贵族复辟势力在浩罕支持下的武装入寇。清朝政府动用了千余万两军费,除新疆本地驻军外,还调动了陕西、甘肃、四川、山东、北京以至东北地区的军队,才将它平定下去。在官僚中又出现了一些奇谈怪论,最突出的是竟然有人主张将长期羁留北京的张格尔的叔叔阿布都哈里“赏给职衔,放归回部,管理西四城回众”。^①这种论点,说穿了就是要让新疆退回到和卓的分裂割据状态中去,是违背新疆人民的统一愿望的,也是违背全国人民利益的。

龚自珍奋起反击了这股复辟倒退的逆流。在《西域置行省议》一文的开头,他就热情称颂了清王朝统一天山南北的战争,指出:“然而用帑数千万,不可谓费;然而积两朝西顾之焦劳,军书百尺,不可谓劳;八旗子弟,旗绿疏贱,感遇而捐躯,不可谓折。”有力地驳斥了一小撮分裂论者对国家统一事业的无理责难。《御试安边绥远疏》是龚自珍中进士后参加朝考时奉道光皇帝之命写的奏疏。他毫无畏惧,直陈无隐,尖锐地抨击了“纷纷请弃地,或退保九边”的投降卖国论调,明确指出新疆自古以来是中国的疆土,“千万年而无尺寸可议弃之地”^②。在统一与分裂的大是大非问题上,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从而与那些形形色色的分裂论、卖国论划清了界限。

为了进一步驳斥投降卖国论者的谬论,龚自珍针锋相对地提出了移民实边的主张。他归纳成两句话:“人则损中益西,财则损西益中。”就是说,要打破清朝政府设置的禁止内地人民移居新疆的层层障碍,动员中原地区的人民西迁新疆,发展新疆的生产,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以减轻中央和内地省分的“协饷”负担。

在移民实边的问题上,龚自珍不是单单从边疆出发,而是立足于全国。

① 《清宣宗实录》第123卷,中华书局版《清实录》第34册,第1064页。

② 《西域置行省议》、《御试绥远安边疏》,《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5~110页、112~114页。以下凡引此二文者不再一一注明。

当时,在内地广大农村,地主兼并土地的现象很严重。大批农民失去土地,辗转流入城市,成为无业游民,挣扎在死亡线上。这在当时形成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龚自珍当然无法揭示产生这个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但是他看到了这个现象。他指出:“自乾隆末年以来,官吏士民,狼艰狈蹙,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又或飧烟草,习邪教,取诛戮,或冻馁以死,终不肯治一寸之丝、一粒之饭以益人。”而且这种现象“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各地都有。从事生产的人数大量减少,生产力遭到破坏,造成了全国的财政恐慌。“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

面对着全国财政入不敷出的情况,清朝政府所采取是的“开捐例,加赋,加盐价”,即卖官鬻爵,增加赋税,向劳动人民转嫁负担的政策。龚自珍抨击这种政策,说它是“割臀以肥脑,自啖自肉”,是一种饮鸩止渴,自己残害自己的办法。与此相反,他大力提倡移民实边的办法。龚自珍建议“大募京师游食非土著之民,及直隶、山东、河南之民,陕西、甘肃之民,令西徙”。其他各省人民“愿往者皆往”。组织失去土地的农民到新疆修渠引水,开荒种地,从事生产。“与其为内地无产之民,孰为西边有产之民,以耕以牧,得长其子孙哉!”

值得注意的是,龚自珍还强调要推广和制造新式农业机械,建议采用有实用价值的“西洋奇器”,凡是“田中可用者令仿造”。在当时闭关自守的风气中,能够看到学习和推广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以促进本国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意义,这确实是具有远见卓识的。

为了奖励农业生产,龚自珍主张,凡是到新疆来的移民,皆由官给路费、毡房、牛具、土地、籽种,每年将收获的十分之一交当地公仓,“其地丁钱赋,应暂行免纳,俟二十年后,再如内地交谷外,另有丁赋例。”在赋税年年增加的时代,用二十年免交地丁钱赋吸引内地人民前往新疆垦荒,发展经济,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未尝不是一个事半功倍的好办法。

从历史上看,移民实边,从来就不是作为一项单纯的经济措施,而是作为一项以巩固边防为主,包含军事、政治、经济在内的综合性措施来执行的。如果说龚自珍在《西域置行省议》中着重论述的是移内地之民发展边疆经济的话,那么,在《御试安边绥远疏》中,对发展边疆经济同保卫边疆的关系论述得就比较充分了。

龚自珍总结了清王朝在平定张格尔事件时远至吉林、黑龙江调兵遣将的经验教训,指出大功虽然告成,但是,“劳师靡饷,骚扰州县。伏考史册,

未睹此用兵也”，以此说明嘉庆以来军备废弛的程度。要改变这种状况，唯一办法是加强新疆地方兵力，特别是加强北疆兵力，做到南疆如有征调，“宜调发及于北路而止”，再从更远的地方调兵，就是“甚非策也”。他还建议增强伊犁将军所辖之驻防兵力，责成伊犁将军勤加训练，使这些驻防军成为“一可当百”的劲旅。清朝政府在新疆驻扎军队，一是为了镇压人民，二是为了抵御外国侵略。如果主要是为了镇压人民，那么就应当将重兵置于南疆。为什么龚自珍要将新疆军事布防侧重于北疆，而北疆又将劲旅重点配置于伊犁地区呢？考虑到沙皇俄国对我国西北边境的威胁，可能是使他建议作这样部署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要增强新疆驻军，解决粮饷是个首要问题。龚自珍并不赞成由内地各省分摊协济的传统方法，而是主张立足于新疆本地经济的发展。他建议“开垦则责成南路，训练则责成北路”，正是从发展新疆经济与增强边防二者并重而提出来的。这就是说，要以南路之粮养北路之兵，以北路之师守卫祖国的西大门。一句话，就是新疆应当建立一个能够独当一面的作战体系。他认为只要农垦事业与军事训练并举，数年之后，新疆就能够做到“钱裕，粮裕，用物裕，官私一切裕”。生产发展了，物用充盈了，“常则不仰饷于内地十七省，变则不仰兵于东三省”，真正做到“足食足兵”，“以边安边”，国家富强，边境义安。这对于抵抗沙皇俄国对我国西北地区的侵略，保卫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是有深远的战略意义的。

在龚自珍关于新疆问题的这两篇政论中，最强烈地体现了他的“更法”思想的，莫过于在新疆全境实行郡县制及“夺伯克之权”两大建议了。其实，这是关于新疆建省这一建议的两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是涉及当时新疆行政制度的重大改革，有利于社会进步的重要主张。对新疆历史和现状缺乏深入的研究，没有一点革新精神的人，是提不出这样精辟和独到的见解来的。

清王朝在新疆等边疆地区实行的是军府制统治。新疆之推行军府制度始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这是一种多元化的行政体制，最高统治者是将军，设于伊犁，即称伊犁将军。下辖乌鲁木齐都统及各城参赞大臣、办事大臣等，统治全疆各地。巴里坤及乌鲁木齐地区因为回、汉民众众多，实行郡县制，设立镇西府和迪化州，各辖几个县，上设镇迪道，隶属于甘肃省。在南北疆游牧地区，则推行扎萨克制，立当地头人为王、公、台吉，以统治蒙古族和哈萨克族人民。南疆农业地区基本上维持原有的伯克制，各地设阿奇木